

Taiwan
Economic
Forum

經建專論

THESIS

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之探討： 國際發展與台灣實證

經建會綜合計劃處 林慈芳*

壹、前言

貳、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之問題與對策：國際發展

參、台灣所得分配的變動及與經濟成長的關聯

肆、兼顧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的模擬分析與策略

伍、結語與建議

摘要

經濟成長的果實分配給各生產要素，分配的方式將影響所得分配的均等度，反之，所得分配亦會影響經濟成長持續的期間。因此，從長遠的角度而言，縮小所得差距與持續性的經濟成長是同一件事情的兩面（two sides of the

* 作者為經建會綜合計劃處專門委員，本文獲本會 101 年度研究發展「總體經濟」類特優獎；本研究為個人觀點，不代表本會意見。

same coin)，同等重要。過去 10 多年，OECD 國家所得不均持續上升有 75% 係來自勞動所得差異擴大，因此多數國際機構提出包容性成長以達到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雙贏的目標。UNCTAD 認為除包容性成長外，採取平衡成長模式，鼓勵工資與勞動生產力同步增加，可使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形成良性循環。近 10 年，國內所得分配無論在初次的功能性分配或及重分配後的家庭可支配所得分配均呈現不均擴大的現象，已造成國內景氣循環擴張期縮短，降低經濟成長的永續性。本文就國內所得分配擴大的原因及其如何與經濟成長形成良性循環進行探討，發現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形成良性循環的關鍵在工資與勞動生產力同步成長。另利用總體計量模型進行兼顧國內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的模擬分析並提出對策。

壹、前言

近 20 年全球多數國家所得分配差距不斷擴大，OECD 國家吉尼係數的平均值由 1985 年的 0.29 增至 2008 年的 0.316；開發中亞洲國家的所得分配更不平均，整體吉尼係數由 1990 年代的 0.39 增至 2000 年代的 0.46，最富有家庭收入所占比例呈不斷上升趨勢。所得分配不均是否會影響經濟成長，經濟成長的過程中能否兼顧所得分配等議題，備受國際關注，IMF、OECD 及 ADB 等國際組織皆提出深入的探討。

IMF2011 年 9 月「金融與發展 (Finance & Development)」中專文「公平與效率」指出，某種程度的所得分配差距對投資與經濟成長的激勵作用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差距過大可能破壞成長，因為它可能造成政治上的不穩定性，這種動盪不利投資，且具有加劇金融危機發生的風險。根據 IMF 研究部副主任 Ostry 等 2012 年的研究顯示，所得分配是影響經濟成長持續期間 (growth spells) 關鍵因素，提高所得分配的公平性同時也可以帶來效率的提升使長期成

長更具持續性，亦即從長期的角度觀察公平與效率間的取舍（trade-off）可能不存在。

ADB2012 年 4 月公布「2012 年亞洲發展展望（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2）」報告，指出在亞洲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貧窮的降低較全球其他地區快速，但貧富差距亦日益擴大。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正在損害亞洲地區的增長和穩定，因為所得分配不平均不僅抑制貧窮的降低也會透過經濟、社會及政治等機制影響成長。ADB 強調降低所得分配不均對亞洲國家的重要性及急迫性，因為所得不均是影響機會（特別是教育機會）不均等的重要因素之一，機會不均等又將擴大所得分配的不均，形成惡性循環。

OECD2012 年 2 月公布「2012 年經濟政策改革（Economic Policy Reforms 2012：Going for Growth）」報告指出，全球危機凸顯結構改革的必要性，部分結構性改革雖可能會產生短期負面影響，但設計良好的改革計畫將帶來最大增益並減緩過渡成本。如促進人力資本累積、減少勞動市場雙軌化等就是可產生雙重紅利，既可縮小分配不平等又能推動人均 GDP 的長期增長。

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2012 年 9 月發布「貿易與發展報告（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指出，縮小日益擴大的財富及所得差距，不僅可帶來公平與社會福利，並能提高經濟成長力，並認為目前已開發國家所採取緊縮財政及壓縮工資的政策並無法實現財政赤字的減少，因為工資緊縮只會進一步削弱經濟成長，並無法刺激投資及創造就業，因此，建議採取所得政策及運用累進稅與社會支出對所得進行再分配，以提高公平並促進經濟效率。

近 10 年國內家庭市場所得五等分位所得差距皆高於 7 倍，98 年受全球金融海嘯影響更創新高達 8.22 倍，政府雖擴大移轉收支使所得分配差距平均縮小 1.47 倍（較 80 年代所得重分配效果 0.66 倍為高），但加計所得重分配效果後的所得差距仍多高於 6 倍。未來，改善所得分配已列為政府「黃金十年 國家願

景」計畫的重點工作之一，能否讓所得分配更均等，如何在經濟成長中兼顧所得分配的議題，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本文研究重點有三：（1）檢視國際主要機構對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間之問題與對策的看法；（2）分析近 10 年台灣所得分配惡化的原因及與經濟成長的關聯；（3）進行台灣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良性循環的政策模擬並提出對策。本文共分五節：第一節前言；第二節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之問題與對策：國際發展；第三節台灣所得分配的變動及與經濟成長的關聯；第四節兼顧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的模擬分析與策略；第五節結語與建議。

貳、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之問題與對策：國際發展

一、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的關係

（一）理論

- 理論上，經濟成長後各生產要素係依其邊際生產力的大小獲得分配，因此，有些經濟學家如 Hayek 等認為，基本上，所得分配不均係反映每個人天賦的差異，是經濟發展的正常結果。政府若採取公共政策加以影響，可能破壞市場運作的效率，降低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誘因，因而減弱經濟成長，反而導致絕對的貧窮（absolute poverty），政府只需提供機會的公平（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另有些經濟學家主張「有效的不均（effective equality）」是有利經濟成長的，因為可提高工作的誘因，且財富集中及較高的儲蓄率均可激勵投資，因此應容忍適度的所得不均。
- 基本上，所得分配不均對經濟成長的影響有四個管道，第一個管道：為分配不均對總合需求水準及組成的影響，即對消費投資等的影響；第二個管道：所得分配不均對經濟成長並無直接衝擊，而是因造成社會的不穩定，

對投資活動不利所產生的間接影響；第三個管道：是透過政治途徑投票產生影響；第四個管道：為透過資本市場及教育投資發生影響，因為信貸市場不完善以致人力資本投資不足等。

（二）實證

1. 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的關係

實證上，Kuznets（1955）提出每人所得與所得分配不均呈倒 U 型的關係，認為開發中國家的所得分配會隨著經濟成長呈現先惡化後均等的現象。但並未隱含兩者有必然的因果關係。就近 20 年 OECD 國家及亞洲開發中國家在成長與所得分配表現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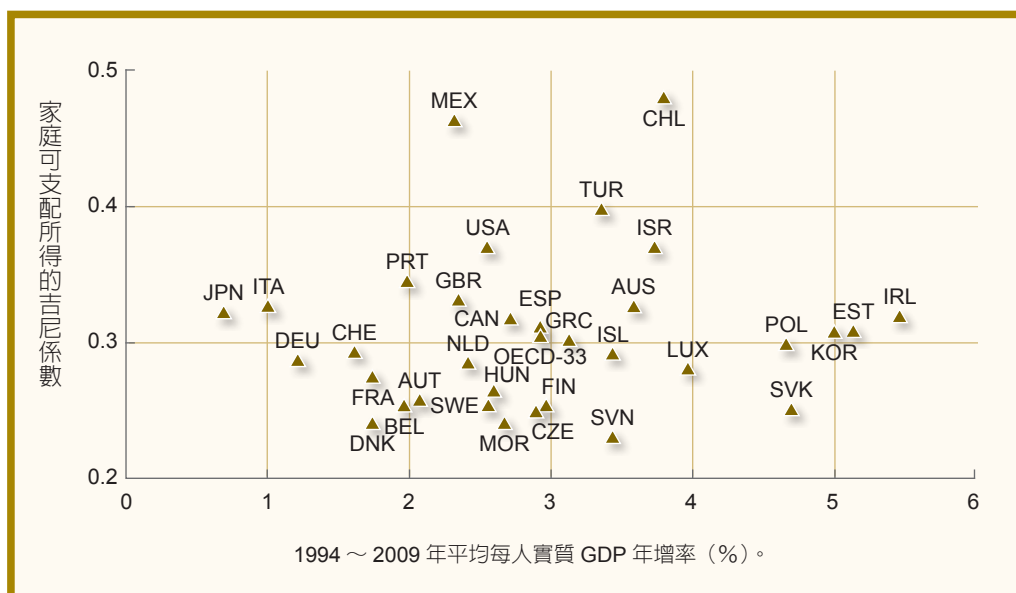
（1）OECD 國家

- OECD（2012）指出針對 OECD 國家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關聯性的實證研究並無定論；而根據 1994 ～ 2009 年 OECD 國家的實際資料亦顯示，每人所得成長與吉尼係數間未呈現相關。

（2）開發中亞洲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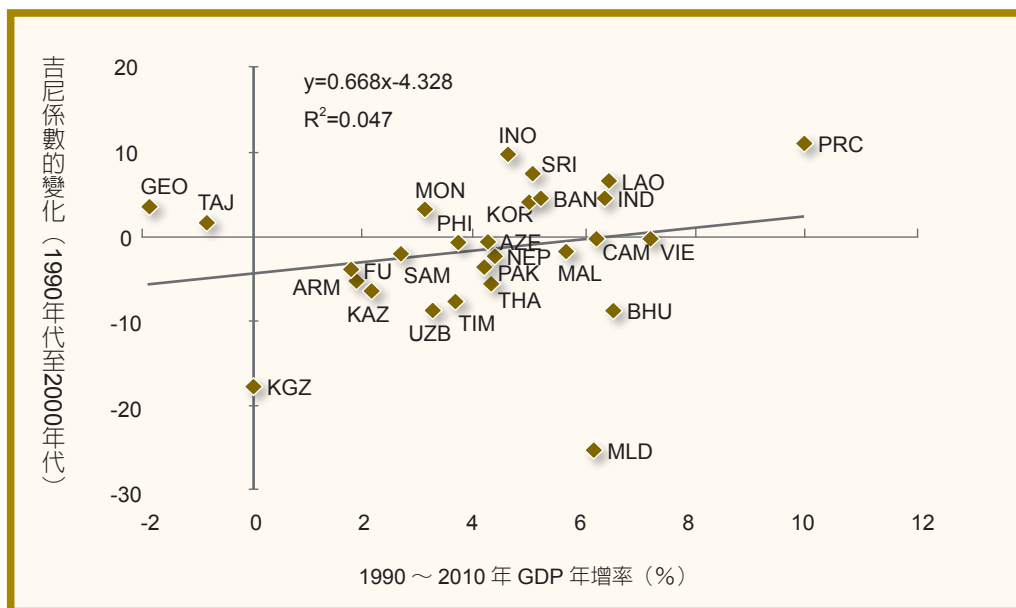
- 根據 ADB（2012）研究，1990 ～ 2010 年中國、印度、東協等 27 個亞洲國家 GDP，平均每年 GDP 成長率與吉尼係數的變動呈現顯著性正相關，顯示經濟成長越快國家，所得分配不均之擴大亦較快，成長與公平間存在抵換（trade-off）的現象。

另 UNCTAD（2012）指出，近期的實證研究大多顯示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存在負向相關。這與 1980 年以來多數國家經濟成長的同時所得分配不均亦漸增的實際現象相一致。



資料來源：OECD (2012)。

圖1 1994~2009年OECD國家每人所得成長與基尼係數之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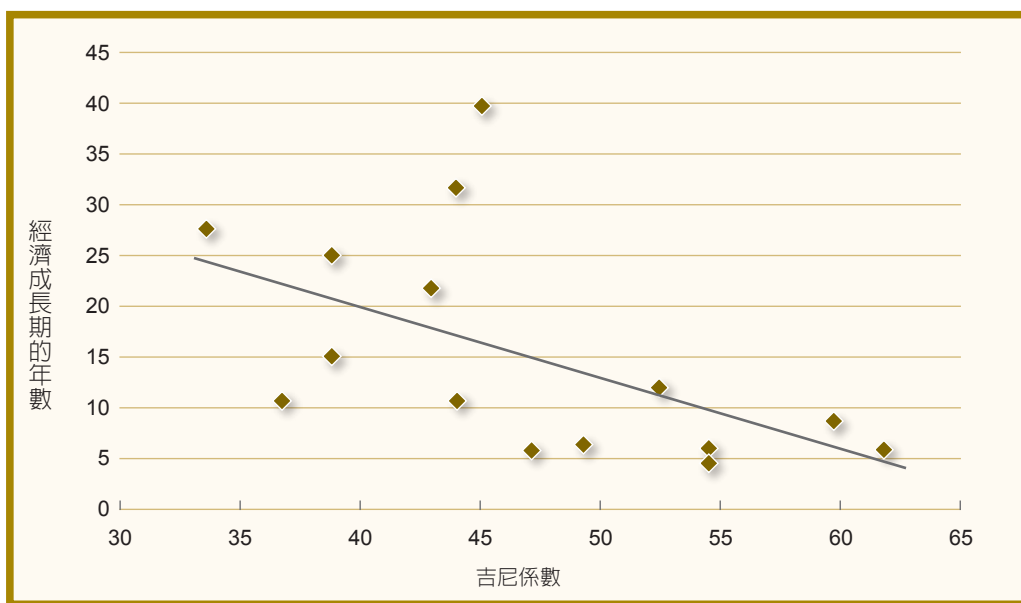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ADB,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2.

圖2 1990~2010年亞洲國家經濟成長與基尼係數變動之關係

2. 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持續期間的關係

- 根據 1950～2006 年比利時、巴西、新加坡及泰國等 15 國的資料顯示（圖 3），基尼係數與經濟成長持續期間呈現負向相關，反映所得分配差距擴大可能造成經濟成長持續時間的縮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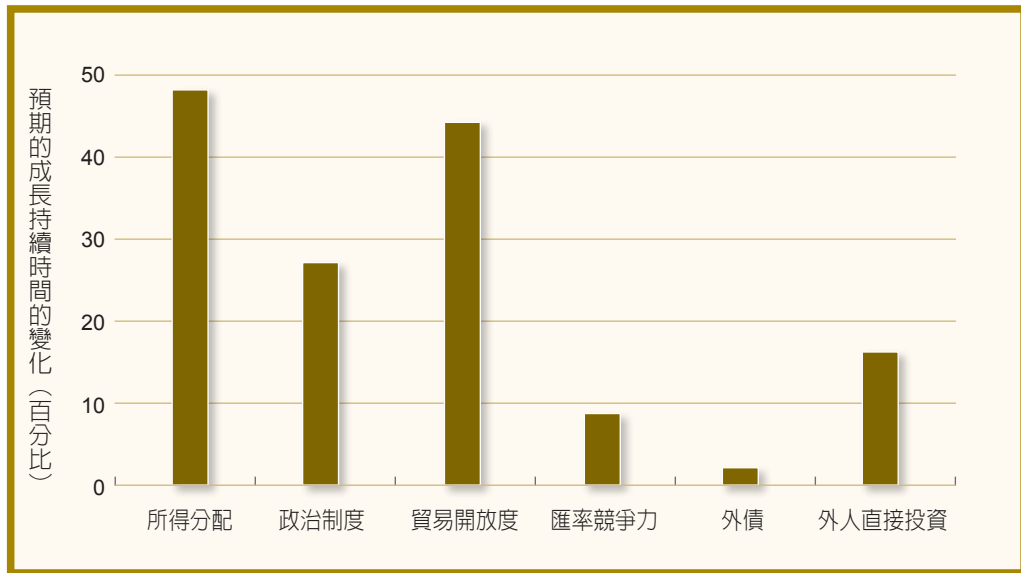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IMF, Finance & Development, Sept. 2011.

註：基尼係數的範圍為 0 至 100；所有經濟成長期至少 5 年。

圖3 1950～2006年巴西等15國經濟成長持續期間與所得分配之關係

- 根據 IMF 研究部副主任 Ostry 等的研究（2012），針對 140 個國家所作的實證研究，發現影響經濟成長持續時間的因素包括所得分配均等度、政治制度、總體經濟穩定性、貿易開放性等，其中所得分配均等度是一個關鍵的決定因素。若將影響經濟成長持續期間的因素如所得分配差距（以基尼係數為代表）、貿易開放度、政治制度、外人直接投資等分別變動 10 個百分點，可使經濟成長期的預計持續時間分別提高 50%、45%、25% 及 15%（圖 4）。



資料來源：IMF, Finance & Development. Sept. 2011.

圖4 不同因素變動對經濟成長持續期間的影響

二、所得分配不均之原因與因應對策

所得分配差距擴大可能縮短經濟成長的持續期間，但考慮不周全的縮小所得分配措施可能達不到預期的目標，因為若這些措施扭曲激勵作用將破壞經濟成長則它們對窮人的影響是弊大於利。OECD、ADB 分別探討 OECD 國家及亞洲國家所得分配不均之原因並提出因應對策，另 UNCTAD 亦提出其看法，分述如下：

(一) OECD

1. 所得分配不均之原因

OECD 指出，過去 10 年多數 OECD 國家的家庭市場所得（household market income）分配不均持續上升，主要反映在勞動所得的差異擴大。平均而言約有 75% 係來自勞動所得差異擴大，有 25% 係源於自僱（Self-employment）所得與資本所得差異變大。

- 根據 OECD（2012）研究，導致所得分配不均的原因包括政策性及非政策性（non-policy）兩種因素，其中技術進步與全球化等非政策性因素僅能解釋勞動所得分配不均的部分原因。結構性政策包括教育政策、勞動市場及商品市場等政策與制度的不同也是影響 OECD 各國所得分配有所差異的原因。根據 OECD 的實證研究，對正規工作的保護程度降低一個標準差可使家庭所得十等分位差距降低 0.16 倍；總人口中大專教育程度所占比重提高 10 個百分點可使家庭所得十等分位差距降低 0.04 倍；工會會員提高 10 個百分點可使家庭所得十等分位差距降低 0.01 倍。
- 2000 年代後期，OECD 國家考量重分配效果後的吉尼係數介於 0.23 至 0.48 之間。在 OECD 某些國家，政府的移轉支付對降低所得分配不均也發揮顯著的影響。平均而言，重分配措施使 OECD 國家分配後的家庭可支配所得吉尼係數較分配前減少 25%，其中有四分之三來自現金移轉措施（以重分配效果低的老年年金為主）的貢獻，有四分之一則來自租稅措施。

2. 因應對策

OECD 研究顯示教育政策（如促進受教育的公平性、提高高中大專的畢業比重）、反歧視政策（如本國人與移民者、男女間的差異）、設計良好的勞動市場制度、極具累進性的政府移轉支付系統均有助於降低所得分配不均。

（1）OECD 建議各國在進行結構改革時採取促進經濟成長與降低所得分配的雙贏策略，各項政策如下：

- 勞動市場制度方面：降低暫時性勞工與正式勞工間就業保護的差異（即降低勞動市場的雙元性）；增加積極勞動市場政策（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ies）的各項措施支出如提高在職業訓練或就業謀合等；提高女性勞參率。

- 其他政策方面：外國學歷認定的透明化等以促進移民的融合；消除性別歧視。
- 教育政策方面：提高教育的質與量，以提升人力資本的累積。措施如增加就業者中高中教育的比重；促進教育的公平，以減輕教育機會受個人及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如加強學校與家庭的聯繫以幫助弱勢兒童的學習。
- 租稅政策方面：不僅會影響稅後的所得分配亦會透過對勞動供需及生產力的影響對稅前的所得分配發揮影響。OECD 建議對資本利得課稅時應減少對資源使用造成扭曲或重新評估較有利於高所得者的稅式支出如房貸利息的租稅減免等租稅改革都是能兼具成長與公平的政策。

表1 結構性政策對經濟成長及所得分配的影響

措施（增加）	就業率	工資均等度	勞動所得分配公平	每人 GDP
就業者高中教育比重	~	+	+	+
教育公平	~	+	+	+
最低工資占中等工資比重	0/-	+	~	0/-
工會化	~	+	+	~
積極性勞動政策的支出	+	+	+	+
暫時性與正式勞工間就業保護的差異	-	-	-	-
失業補助的期限與替代率	-	+	~	-
反商品市場競爭性管制	-	0/+	~	-
消除歧視措施	+	+	+	+
提高女性勞參率	+	+	+	+

註：~ 表示不確定；0/- 表示有些研究結果為無顯著性影響，有些則呈現負向影響。

資料來源：OECD（2012）。

（2）OECD 指出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公平具抵換關係的策略有：

- 將租稅組合由所得稅轉移至消費稅或不動產稅：將租稅組合由對生產力資本累積及勞動使用具較高扭曲性的所得稅（具累進性）轉移至具

扭曲性低的消費稅或不動產稅（具累退性）雖有助於經濟成長但將降低公平性。

- 提升工資訂定的彈性：OECD（2012）實證結果顯示，提高工會密度或將工資集體協議（collective wage agreements）擴展至非協議的組織等提升工資訂定彈性的措施均具壓縮工資分配的效果。然由於不利生產力因此將使就業降低，故可能提高勞動所得分配的不均。

（3）OECD 指出有些結構改革政策雖可使經濟成長但對降低所得分配不均之效果是不確定的，包括：

- 避免過高及過久的失業補助：過高及過久的失業補助會降低失業者找工作的誘因，市場上工資水準提高，因而會使就業率降低，也會壓縮工資分配的不均。短期而言將使所得不均降低，因為對失業者所得補助的效果將主導超過就業率降低所造成對所得分配的不利影響，但長期來看降低所得分配不均的效果則不確定。

表2 租稅改革對經濟成長及所得分配的影響

租稅政策	對所得分配公平的影響	對每人 GDP 的影響
1.增加總稅收	+	—
2.改變租稅組合維持總稅收不變		
（1）由個人所得稅轉至消費稅	—	+
（2）由勞動稅轉至資本、財產稅		
由勞動稅轉至資本利得稅	~	+
由勞動稅轉至不動產稅	—	+
（3）削減稅式支出或邊際稅率	+	+

註：~ 表示不確定

資料來源：OECD（2012）。

- 將租稅組合由所得稅轉移至財富稅或遺產稅：所得稅、遺產稅均具累進性故租稅組合由所得稅移轉至遺產稅雖對經濟成長有益，但對公平的效果則不確定。
- 放寬產品市場的管制：雖有助經濟成長，但對降低所得分配不均的效果並不確定，因為產品市場自由化雖有助於就業的創造但其對工資差異的衝擊為正或負在實證上並無定論。
- 降低基本工資：雖有助於青年或低技能勞工的就業，但會使工資的差異擴大，因此對降低所得分配不均的整體作用是不確定的。

（二）ADB

1. 所得分配不均之原因

根據亞銀報告（2012），近 20 年開發中亞洲國家經濟快速成長的三項驅動力——技術進步、全球化及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market-oriented reform）政策，也是導致所得分配不平均的基本原因。上述三項因素交互作用經由資本（勞工與資本）、技能（技術勞工與非技術勞工）及空間（農村與城市）三個途徑，使得有良好教育或技能的工人具技能獎金（skill premiums）能獲得較高的收入增長，多數國家的所得不均約有 25 ～ 35% 係來自此項差異；另技術進步亦較有利於資本，加以亞洲地區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而資本相對短缺，均壓抑工資的成長，造成實質工資的增加落後於勞動生產力的成長率，導致勞動收入在國內生產毛額中所占比重持續下降。此外，新技術、基礎設施和投資分布的高度不均衡，進一步加劇了城鄉之間的差距鴻溝，產生區域發展的不均衡，多數國家的所得不均約有 30 ～ 50% 導源於此項因素。

2. 因應對策

ADB 指出，所得分配不均將有損於政治的穩定、社會的凝聚力及經濟成長的永續性，甚且造成貧困人口在教育、醫療和其它公共服務等機會的不平等，妨礙貧困人口獲得改善生活水準的機會，進一步擴大收入差距，形成不平等的惡性循環，因此 ADB 強調降低所得分配不均對亞洲國家的重要性與迫切性。

ADB 認為，由於導致所得不均之因素也是驅動經濟成長的主要來源，因此，因應對策不是要消除不均而是要降低不均，且無損於經濟成長。ADB 提出 3 項達到成長與公平雙贏的策略：

- 有效率的財政政策：措施包括（1）增加教育和醫療投入，特別是對窮人；（2）發展更好的有針對性的社會保護計劃如針對貧困人口進行有條件的現金移轉，將不針對目標人群的價格補貼（如燃油補貼）轉向針對性的群體等；（3）更公平的租稅收入如擴大稅基等。
- 創造高品質就業的經濟成長：措施包括（1）促進結構轉型：營造有利的投資環境、改善基礎設施、放寬管制、推動創新，產業升級，使農工服務業平衡發展；（2）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特別是提供中小企業在融資、技術及市場等的協助；（3）消除要素市場的扭曲如降低金融管制、利率由市場決定、匯率更具彈性等；（4）經濟衰退時推行公共就業計畫；（5）有效的勞動市場制度：在兼顧企業的成本下，提供勞動者技能訓練與必要的就業保護、協助工作謀合，以改善勞工的就業能力及機會。
- 協助落後地區的發展：措施包括（1）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改善區域間的連接；（2）落後地區經濟成長多元化；（3）財政支出轉移至落後地區，以強化落後地區的人力資本及公共服務投資；（4）降低區域間遷移的障礙。

(三) UNCTAD

1. 所得分配不均之原因

- 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報告（2012a）指出，自 1980 年代以來普遍相信各國政府在追求更大經濟效率的同時，必須容忍更大不公平的觀念是不正確。各國所得與財富差距擴大並不是全球化與技術進步兩項因素相互作用下不可避免的必然結果，各國的總體經濟政策、金融政策及勞動市場組織等因素也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 不均等加劇的部分原因係源自公司部門在面對國際競爭擴大時行為的轉變，公司不是透過增加投資提高生產力來應對，而是透過將生產部門外移至低工資國家或藉由威脅外移來保持低工資，以創造利潤。而所創造的利潤並未進一步投資，而是被用於支付分紅及股權回購，以提高公司在股票市場的價值。另各國多以使勞動市場彈性化及降低稅負的方式以吸引外人直接投資，也壓縮工資的調漲。此外，在許多國家伴隨貿易自由化的是國內金融市場監管的放鬆及資本帳的自由化，導致國際資本流量的快速擴張，投入於金融資產的交易，惟相對於實物投資，這種投機性的金融交易累積財富更容易也更快，因此也加劇分配的不均。

2. 因應對策

UNCTAD（2012a）報告指出，中低收入家庭用於消費的比例較高所得者為高，因此所得日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將抑制商品與服務的需求，妨礙國內需求的擴張，並可能使弱勢者無法獲得教育與貸款的機會。故 UNCTAD 認為目前已開發國家經濟無法復甦的根源在於缺乏需求，提出透過財政政策及所得政策減少分配不均，並促進經濟成長，以實現包容性及平衡性的成長模式，其政策如下：

- 所得政策方面鼓勵工資與生產力同步成長：建議改變所得分配的方式，保證實質工資與平均生產力同步成長，名目工資的調整應考量通貨膨脹目標，以維護勞動者在國民所得中分配的比重不下降，並防止相同職業的工資差距拉大，而其實現則可透過雇主與勞工間的集體協商來達成。此外，設立最低法定工資、擴大公共就業計畫除有利於降低不均，亦可使情勢有利於勞方的談判。
- 財政政策方面：課徵累進稅，其稅收可用於低收入群體的社會移轉支出及提供公共部門的社會服務如增加教育支出，有助於包容性的經濟成長。

叁、台灣所得分配的變動及與經濟成長的關聯

一、所得分配的衡量方式

國際間衡量所得分配的方式有二，一為功能性所得分配（functi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採用國民所得統計資料進行分析；二為個人或家庭所得分配，係以家庭收支調查資料進行分析。

（一）功能性所得分配

- 功能性所得分配係指各種生產要素參與經濟活動所獲得的基本所得（primary income）包括工資及營業盈餘（計有利息利潤租金等）二部分。它是國民所得的初次分配，也是決定一個社會最終收入分配的基礎，主要係反映生產要素對產出的貢獻及績效（即效率因素），基本上是由市場機制主導，較少考量公平性的因素。
- 功能性所得分配關注的是所得在勞動與資本間的分配，分配給勞動者的為勞動分配率（勞動報酬／總產出），反映經濟成長中有多大程度轉化為勞

動者的收入增加（相對於資本的報酬）。在經濟衰退時期，勞動分配率可以反映相對於利潤的變化而言，總產出的下降導致勞動收入減少的程度。

（二）個人或家庭所得分配

- 國際間對個人或家庭所得分配的衡量指標包括（1）吉尼係數（Gini's Coefficient）：吉尼係數就愈大，表示所得分配愈不平均；一般以吉尼係數 0.4 為差距過大的警戒線。（2）所得差距倍數：為避免涵蓋的資訊愈少（如十等分位就忽略了 80% 家庭的資料），益加扭曲所得分配的狀況，多以五等分位差距倍數最為普遍。
- 衡量的所得對象：參考 OECD（2011）分析模式，包括（1）個人勞動報酬：影響因素包括工資及就業率；（2）家庭勞動報酬：影響因素除影響個人勞動報酬的因素外，尚包含家庭組成及家庭規模變化的影響；（3）家庭市場所得：即除勞動報酬外再納入產業主所得及財產所得（如利息收入、股息及紅利等）；（4）家庭可支配所得：即在家庭市場所得的基礎上再加入租稅及現金移轉等移轉收支的因素；（5）家庭調整後的可支配所得：即在家庭可支配所得的基礎上，再納入政府非現金公共服務（in kind services）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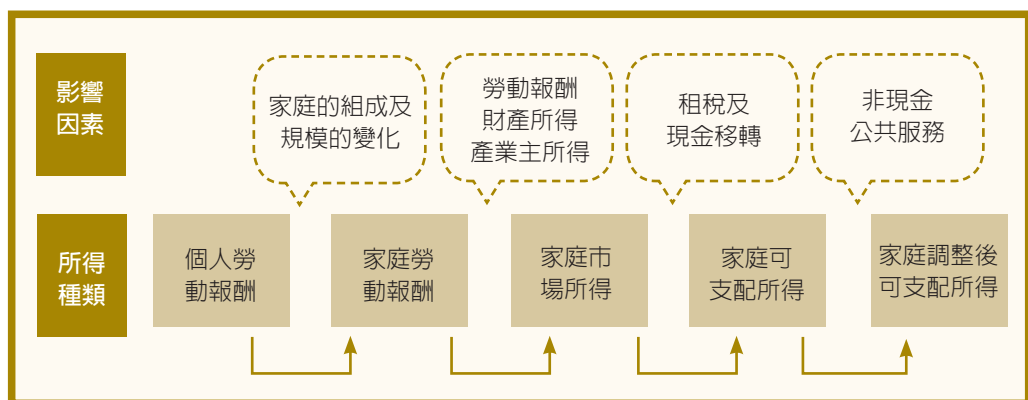


圖5 各種所得的內涵及影響因素

二、台灣功能性所得分配的變動、變動來源及與經濟成長的關聯

（一）台灣勞動分配率的變動與國際比較

1. 1995 年以前：1985 年台灣勞動分配率（受僱人員報酬 / 按要素成本計算的 GDP）62.5%，與英美兩國相當，遠高於日本的 55.0% 及南韓的 45.2%。至 1990 年達到高點 63.6%，其後緩降至 1995 年的 63.3%，較英（60.3）、美（61.4）、日（57.3）、韓（52.7）等國均高。
2. 1995 年以後：台灣勞動分配率趨降，至 2000 年為 58.1%，雖仍高於南韓（48.6）、日本（57.0），但已較英（62.8）美（61.5）為低。其後再續降至 2010 年的 55.9%，較 1995 年降 7.4 個百分點，降幅高於日本（2.3 個百分點）、美國（2.5 個百分點）及英國（0.2 個百分點），顯示台灣勞動分配率趨降的型態雖與國際趨勢相符，但下降的幅度卻較英美等國為快。

表3 1980至2010年各國勞動分配率的變化

單位：%

	1980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台灣	62.5*	62.5	63.6	63.3	58.1	57.2	55.9
英國	67.1	61.9	62.9	60.3	62.8	61.4	62.6
美國	64.6	62.0	62.6	61.4	61.5	59.7	59.0
日本	54.6	55.0	54.1	57.3	57.0	54.8	55.0
南韓	44.3	45.2	50.5	52.7	48.6	51.6	50.6

註：勞動分配率 = 受僱人員報酬 / 名目 GDP（按要素成本計算）。* 為 1981 年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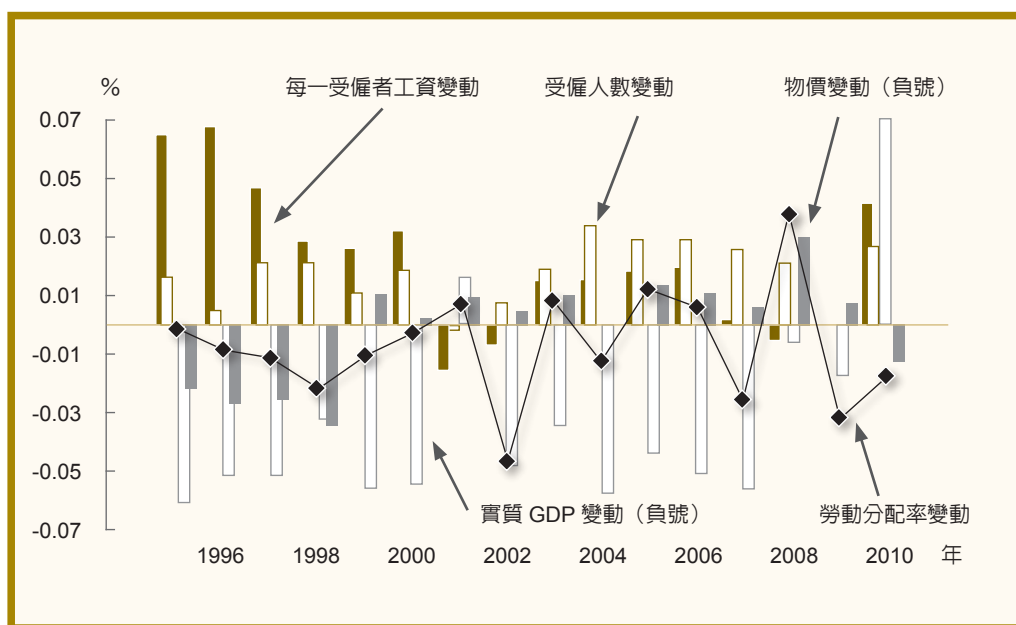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1. 行政院主計總處；2. 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2。

（二）勞動分配率變動來源

1. 影響因素：根據 IMF 等國際機構研究，多認為造成 80 年代以來先進國家勞動分配率下降的原因有技術進步、全球化、勞動市場制度等。OECD 的

就業展望報告（2012）亦指出，技術進步與資本累積對 1990 至 2007 年間先進國家產業間勞動分配率變化的平均貢獻率達 80%。而根據主計總處（2008）研究發現，全球化中之技術進步是造成我國所得分配擴大的主要因素，金融全球化亦加深所得不均程度。

2. 變動來源：根據定義，勞動分配率的變動來源包括工資變動、受僱人數變動、經濟成長率及 GDP 平減指數的變動。2000 年後台灣勞動分配率趨降，由 2001 年 48.33% 降至 2010 年 44.65%，顯示國民所得的初次分配惡化，其主要來源係因工資的低成長，平均僅 0.36%，較名目 GDP 的增加率 3.01% 為低，其間受僱人數平均增加率 1.86%，較工資上漲率為高。



註：勞動分配率變動率 = 工資變動率 + 受僱人數變動率 - 經濟成長率 - GDP 平減價格變動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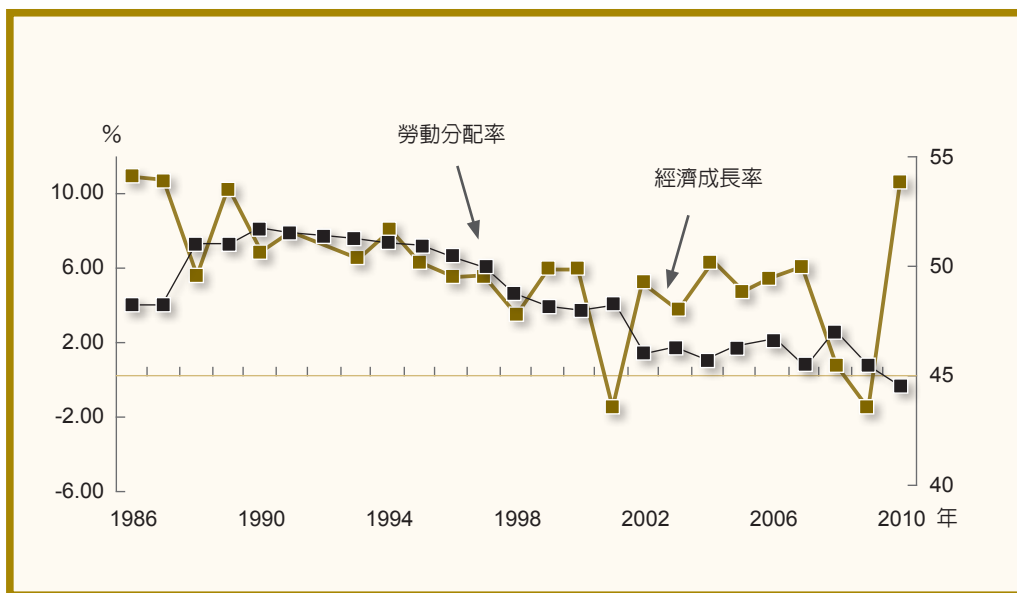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資料計算。

圖6 1995～2010年勞動分配率變動來源係

（三）勞動分配率與經濟成長的關聯

國際勞工組織 ILO2010 / 2011 年的工資報告指出，勞動分配率的短期波動通常具反景氣循環的現象，即景氣擴張時期勞動分配率會減少，而景氣衰退時，勞動分配率反呈增加，顯示在經濟危機時，利潤比勞動報酬更加起伏不定。

1996 ～ 2010 年台灣勞動分配率與經濟成長呈現反景氣循環現象，與 ILO 的研究結果相一致。在 2000 年後兩者的負相關更明顯，相關係數由 1996 至 2010 年 -0.14 提高至 -0.66。



註：勞動分配率 = 受僱人員報酬 / 名目 GDP。

資料來源：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資料推算。

圖7 台灣勞動分配率與經濟成長率

1. 經濟成長影響勞動分配率

- 1991 ～ 2000 年台灣平均經濟成長率 6.24%，來自勞動生產力成長率 4.87% 貢獻占 78%，高於同期間實質工資（GDP 平減指數平減）上漲率 3.51%，反映經濟成長果實未完全由勞動者分享，致勞動分配率（占名目 GDP 比率）由 1990 年之 51.74% 降至 2000 年 48.03%，減少 3.71 個百分點。
- 2001 ～ 2010 年台灣平均經濟成長率 3.92%，較 1990 年代減少 2.31 個百分點，主因勞動生產力成長率降低近 2 個百分點所致。同期間實質工資上漲率降幅更大達 2.24 個百分點，故勞動分配率續降至 2010 年 44.65%。

2. 勞動分配率影響經濟成長

- 國際勞工組織 ILO2012 / 2013 年的工資報告指出，勞動分配率下降對 GDP 各組成份子（消費、投資及淨出口）的影響是不同的，針對歐元區及中國等 15 個國家的實證研究，顯示勞動分配率每下降 1%，各國的民間消費皆下降（因為勞動者的邊際消費傾向一般高於資本收入者），淨出口都上升，但對投資的影響則各國不盡相同，整體影響需綜合三者的效果大小而定。
- 參考 Stockhammer, Onaran & Ederer（2009）的實證模式，推估發現國內勞動分配率提高一個百分點，長期均衡時將提高台灣的 GDP 0.32%。

三、台灣個人或家庭所得分配的變動、變動來源及與經濟成長的關聯

（一）台灣個人或家庭所得分配的變動及變動來源

1. 吉尼係數（台灣每戶可支配所得吉尼係數）：

- (1) 各所得項目的分配變化：產業主所得不均最嚴重，且不均程度趨增
- 就所得來源觀察，產業主所得不均最嚴重，吉尼係數由 1996 年的 0.801 增至 2011 年的 0.850，顯示不均的情況逐漸擴大。
 - 財產所得的不均在 1996 年時雖居最高，吉尼係數達 0.878，但之後遞降至 2011 年的 0.622。
 - 受僱報酬的吉尼係數多在 0.5 以上，由 1996 年的 0.494 增至 2011 年的 0.529。
 - 移轉收入（包括社福補助等）的吉尼係數約在 0.4 上下，由 1996 年的 0.411 降至 2011 年的 0.401，反映政府的社福移轉支出更偏重於對低收入族群的照顧。
 - 移轉支出的吉尼係數由 1996 年的 0.373 增至 2011 年的 0.423，顯示移轉支出（包括直接稅及規費等）使所得重分配更均等的作用減弱。

表4 台灣每戶可支配所得吉尼係數

年	可支配所得	受僱報酬	產業主所得	財產所得	移轉收入	移轉支出
1996	0.317	0.494	0.801	0.878	0.411	0.373
2001	0.350	0.540	0.823	0.850	0.410	0.423
2006	0.339	0.536	0.832	0.657	0.393	0.429
2009	0.345	0.545	0.846	0.624	0.382	0.428
2011	0.342	0.529	0.850	0.622	0.401	0.42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 (2) 所得不均來源：以受僱報酬的不均為主要來源，移轉收入影響最小
- 1996 至 2011 年所得來源中以受僱報酬為主要來源，占 70% 以上，因此，受僱報酬的不均對可支配所得不均的影響程度也最大，居 80% 以上，且影響程度趨增，至 2011 年達 88.6%。

- 產業主所得的影響程度居次：因產業主所得占可支配所得的比重低於 23%，故產業主所得的吉尼係數雖高達 0.8 以上，但影響程度約占 16～22%。財產所得的影響程度則約占 10～13%。
- 移轉收支對所得不均的影響效果：移轉收入占可支配所得比重趨增，由 1996 年的 14.6% 提高至 2011 年的 21.6%，但對所得不均的影響程度小於 6.5%；另移轉支出對降低所得不均的效果漸增，至 2011 年達 20.3%。

2. 五分位所得差距倍數

(1) 個人所得分配的變化及變動來源

- 以所得收入者計算，1996 年台灣每人市場所得五分位差距倍數 6.31 倍，至 2009 年增至 8.39 倍的高點，2011 年略降至 8.25 倍。其中，財產所得及產業主所得的差距倍數較高，在 2004 年後均高於 10 倍；而占市場所得比重逾 70% 的受僱報酬差距倍數雖低於 8 倍，但差距倍數漸趨擴大，由 1996 年的 4.81 倍趨增至 2011 年的 7.45 倍。
- 尤其，2001 至 2011 年受僱報酬平均增加率僅 0.1%，遠低於平均經濟成長率 3.93%。其中最高所得者（第 5 分位）增加 0.75%，最低所得者（第 1 分位）更呈現負成長 1.59%，以致受僱報酬差距由 2000 年的 5.68 倍，擴大至 2011 年 7.45 倍的高點，反映 2000 年後台灣勞動所得成長幾近停滯，且不均大幅擴大。
- 差距來源：1996 年以來台灣市場所得不均主要源自受僱報酬差異擴大，且影響程度遞增，2001 至 2011 年平均占 67.4%；產業主所得及財產受入的差異分別占 24.4% 及 8.2%。顯示受僱報酬差異擴大為所得分配不均的主要來源，與 OECD 國家的不均來源相近。

表5 台灣每戶可支配所得基尼係數變動來源

單位：%

年	可支配所得	受僱報酬	產業主所得	財產所得	移轉收入	移轉支出
1996	100.0	79.2	21.6	12.1	2.1	15.2
2001	100.0	82.7	19.1	11.8	3.1	16.9
2006	100.0	87.0	18.3	10.5	3.2	19.0
2009	100.0	86.5	16.6	11.0	5.4	19.5
2011	100.0	88.6	17.4	10.9	3.3	20.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表6 台灣所得收入者每人所得五等分位差距倍數及差距來源

年	市場所得五等分位差距倍數（倍）				差距來源（%）		
		受僱報酬	產業主所得	財產所得	受僱報酬	產業主所得	財產所得
1996	6.31	4.81	11.76	11.14	59.4	30.8	9.8
2001	7.22	6.35	9.52	9.92	64.5	25.5	10.0
2006	7.97	6.99	11.49	10.59	67.6	24.2	8.2
2009	8.39	7.36	12.24	11.93	68.9	22.6	8.5
2011	8.25	7.45	10.90	11.04	69.7	22.2	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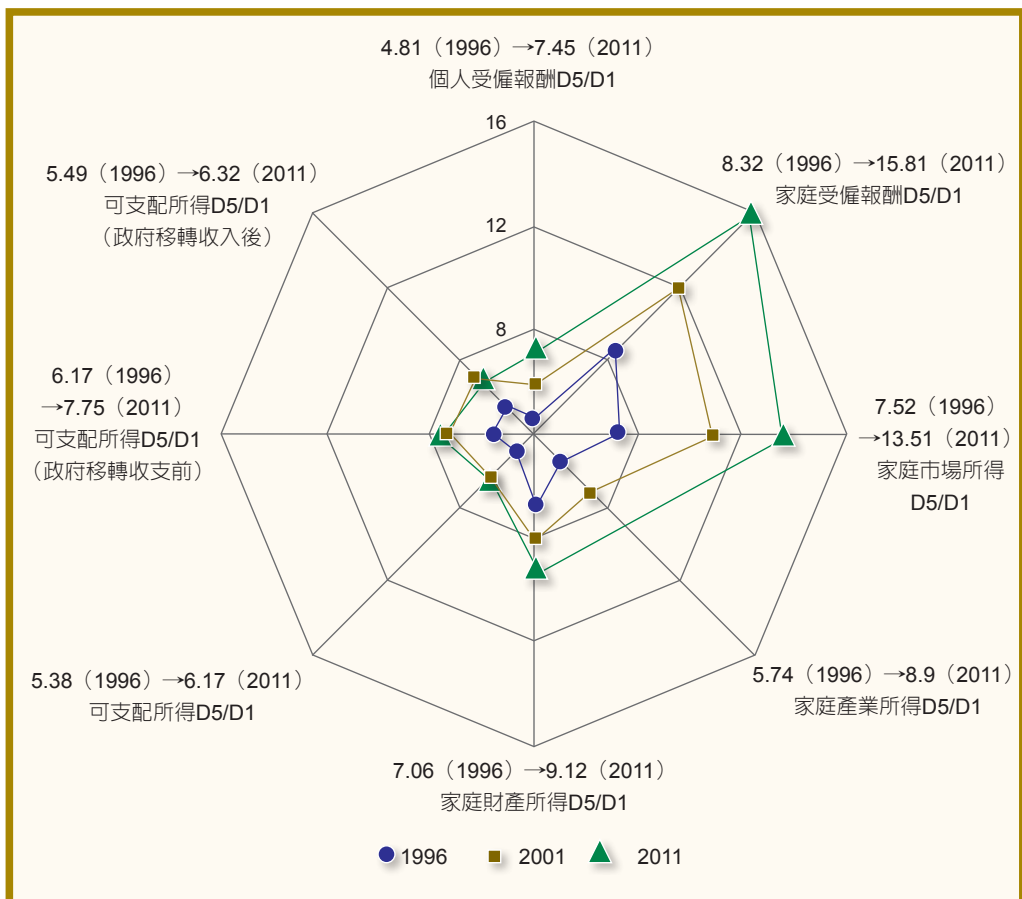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資料計算。

（2）家庭所得分配的變化及變動來源

- 家庭受僱報酬：2011 年台灣家庭受僱報酬五分位差距倍數 15.81 倍較 1996 年提高 7.49 倍，亦較個人受僱報酬的差距倍數 7.45 倍高 8.36 倍，與 1996 年時兩者的差距 3.51 倍相較，提高 238%，顯示家戶組成及規模的變化對家庭受僱報酬的不均擴大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 家庭市場所得：納入家庭產業主所得及財產所得後，台灣家庭市場所得五分位差距倍數由 1996 年的 7.52 倍增 2011 年的 13.51 倍。此 16

年間，家庭受僱報酬差距倍數均屬最大，次為財產所得差距倍數，產業主所得的差距倍數較小。

其間，家庭受僱報酬差距倍數提高 7.49 倍，高於家庭產業主所得差距倍數（增加 3.16 倍）及家庭財產所得差距倍數的擴大（增加 2.06 倍），顯示家庭市場所得不均的擴大主要來自家庭受僱報酬不均的擴大。



註：D5/D1 為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

資料來源：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資料計算。

圖8 台灣個人及家庭所得分配之變化

- 家庭可支配所得：1996 年政府移轉收支前的家庭可支配所得差距倍數 6.17 倍，至 2001 年由於經濟負成長迅速擴大至 7.67 倍，其後政府擴大移轉收支措施使所得差距降至 2011 年 6.17 倍，縮小 1.50 倍，重分配效果使所得差距降低 19.56%，為 1996 年的 1.5 倍。2001 至 2011 年政府移轉收支措施使所得差距倍數平均縮小 1.47 倍，其中有 9 成是來自社福補助等措施，有 1 成係由租稅等措施所產生的效果。顯示租稅政策在作為所得重分配的功能上尚有改進的空間。
- 家庭調整後可支配所得：2009 ～ 2011 年平均每戶獲得政府實物給付金額約 1 萬元，其中低所得組 2.3 萬元，為主要受益者，高所得組 0.5 萬元，低所得組，為高所得組的 4.3 倍，使所得差距由平均 6.24 倍降為 5.79 倍，縮減 0.45 倍。
- 家庭市場所得不均來源：1996 年台灣家庭市場所得五等分位差距倍數 7.52 倍，逐年提高至 2000 年的 9.06 倍，2001 年更大幅增加為 11.16 倍，擴增 3.64 倍，其來源有近 9 成係因為受僱報酬差距擴大 7.49 倍。其後趨增至 2009 年達 14.02 倍高點，2011 年略降至 13.51 倍，較 2001 年提高 2.35 倍，變動來源中有 61.6% 係源自受僱報酬差距擴大 3.44 倍，而財產所得差距擴大的影響增至 6%，影響程度為前一期間的 2 倍以上。

表7 台灣家庭每戶市場所得五分位差距變動來源（動態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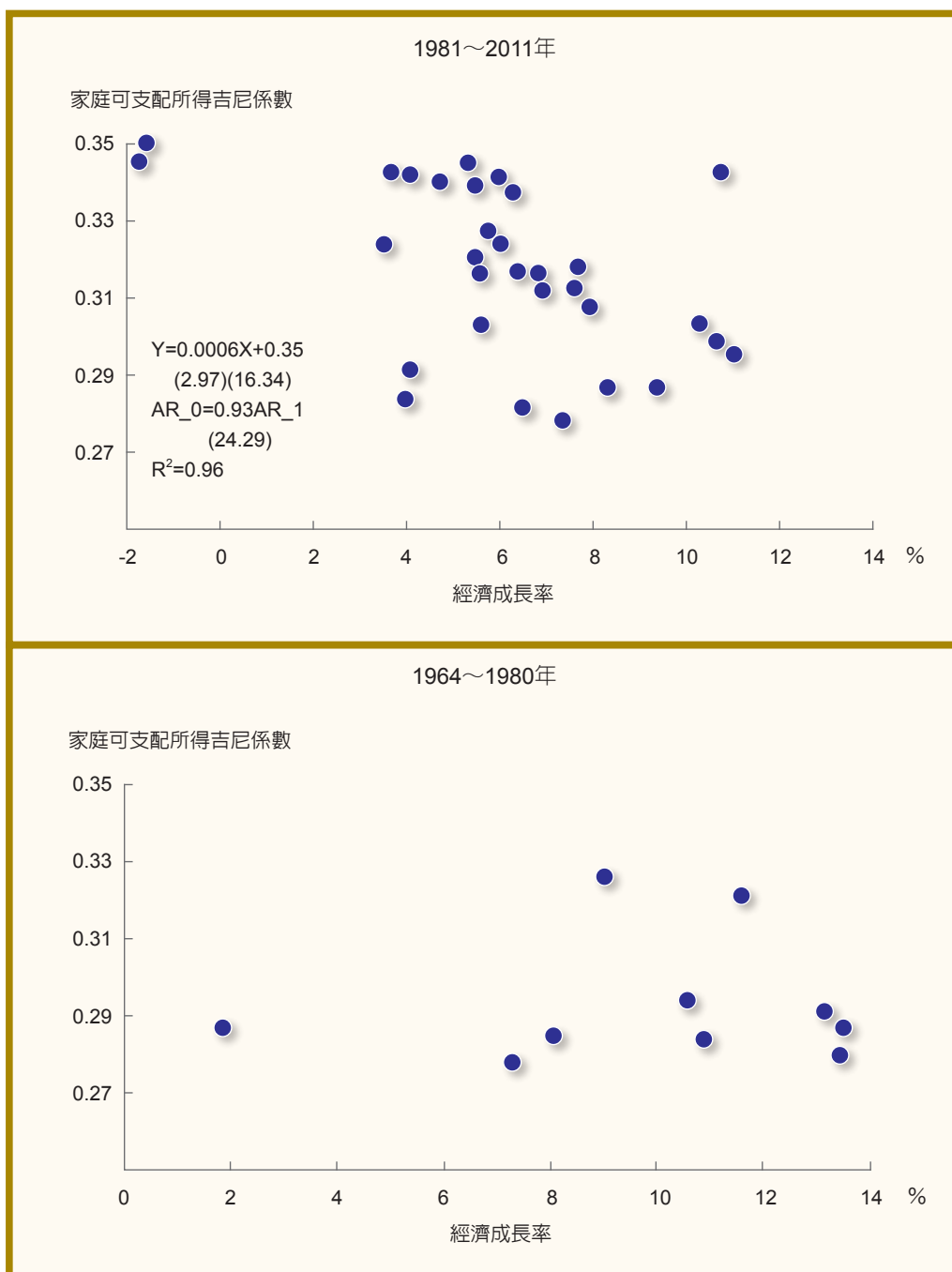
期間	市場所得五等分位差距之變動（倍）	變動來源				
		所得來源分配變動效果			份額變動效果	
		受僱報酬	產業主所得	財產所得		
1996～2001	3.64	105.0	89.8	12.8	2.4	-5.0
2001～2011	2.35	83.6	61.6	16.0	6.0	16.4

資料來源：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資料計算。

（二）台灣個人或家庭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的關聯

1. 台灣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的長期變化

- 1964 ～ 1980 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平均 9.86%，家庭可支配所得基尼係數由 1964 年 0.321 降至 1980 年的 0.278，在經濟高速成長的過程中，所得分配顯現平均化的趨勢，不符 Kuznets（1955）所提兩者呈倒 U 型的關係。根據邊裕淵（1979）及梁國樹（1978）等的研究主要歸因於：勞力密集生產方式的普及、實施土地改革、扶持中小企業及教育普及的政策等因素。
- 1981 ～ 2011 年：1981 至 1996 年台灣平均經濟成長率降至 7.39%，家庭可支配所得基尼係數由 1981 年 0.281 趨增至 1996 年的 0.317，根據研究，多數認為係家庭結構改變所帶來的影響，其中教育程度的提升則有助於分配不均的改善（陳建良，2011）。1997 年後分配不均更加惡化，基尼係數在 2001 年達 0.45 的高點，之後雖略降但仍高於 0.33，不均惡化的主因為戶長年齡老化（陳建良，2011），而 1997 至 2011 年這期間的平均經濟成長率再降至 4.26%。根據迴歸分析，1981 至 2011 年台灣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間呈現負向關係。



資料來源：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資料計算。

圖9 台灣經濟成長率與家庭可支配所得基尼係數之長期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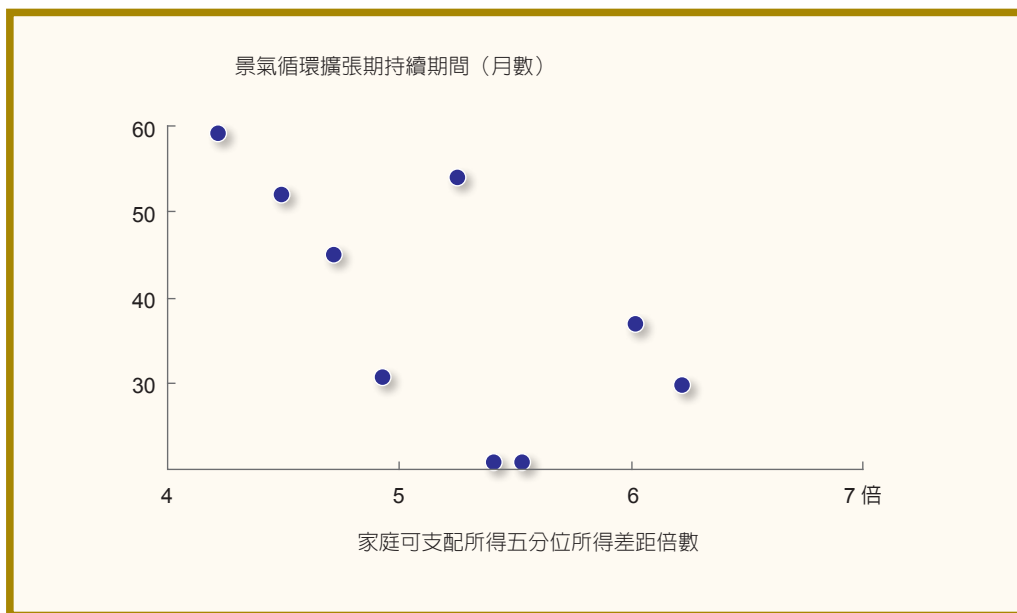
2. 台灣所得分配與長期經濟成長的關聯

(1) 跨國實證

- 根據 IMF 經濟學家 J.D.Ostry 等 (2011, 2012) 對包括台灣在內的 140 個國家，以 1950 ~ 2006 年資料進行實證研究顯示，所得分配確是影響經濟成長永續性的關鍵因素之一，且所得分配差距擴大會縮短經濟成長的持續期間 (growth spells)。
- 另 IMF 「經濟展望報告 (2012 年 10 月)」，分別由衝擊面 (Shocks)、政策面 (Policies) 及經濟結構特性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等 3 個面向，就近 60 年新興市場及開發中經濟體 (包括台灣) 景氣擴張期長度與復甦速度影響因素進行探討，發現所得分配不均會使新興市場及開發中經濟體景氣擴張期縮短。

(2) 國內時間序列資料

- 1980 年後台灣所得分配趨向不均，經濟成長亦轉降，期間僅於 2001 及 2009 年因全球經濟衰退而出現負成長，但景氣循環擴張期的持續期間則由第 5 次循環 (1980 年 1 月至 1983 年 2 月) 的 59 個月，降至第 10 次循環的 21 個月，第 11 及 12 次循環略高於 30 個月。同期間家庭可支配所得五分位所得差距倍數亦由 4.23 倍提高為 6.21 倍，兩者呈現負向關聯 (相關係數 -0.33)，顯示台灣所得分配惡化，確實使經濟成長的永續性降低。



註：資料涵蓋第3至12次景氣循環。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經建會。

圖10 台灣景氣循環擴張期持續期間與所得分配之變化

肆、兼顧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的模擬分析與策略

一、兼顧台灣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工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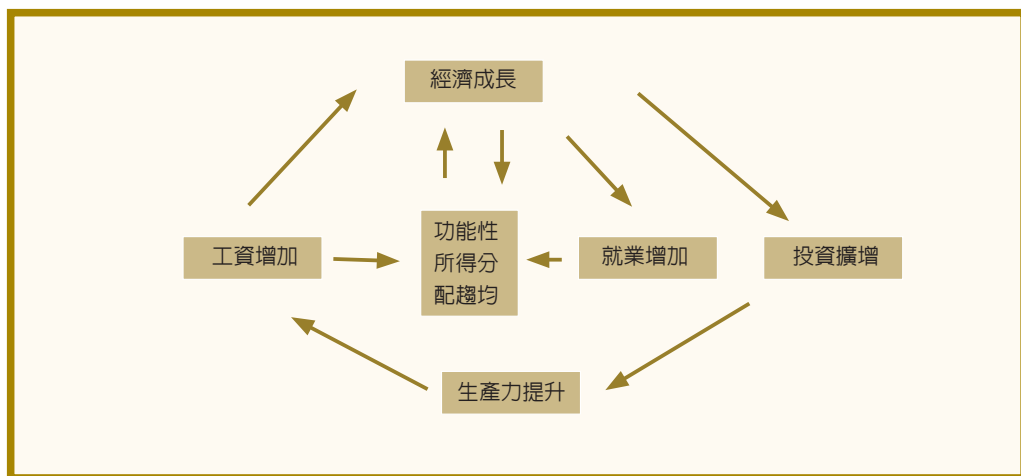
（一）台灣工資、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的關聯

1. 工資、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理論上之關聯

- ILO（2011）指出，依凱因斯傳統理論，功能性所得分配是決定投資、就業及總和產出的關鍵因素。因為工資是影響消費者實質購買力的主要來源，由於勞動者的消費傾向高於資本家，故提高勞動分配率將有助於消費

增加，足以抵銷工資增加對投資及出口的不利影響，使總合需求增加，顯現工資帶動經濟體（wage-led regime）¹ 的特性。

- － 工資帶動的經濟體採取提高工資的政策，將有助經濟成長，進而促進投資擴增，因為投資是由利潤所驅動，而非源自生產成本的降低，其中，利潤的創造則是來自有效需求的提升，因此維持低工資來創造高利潤將會適得其反（UNCTAD 2010）。
- － 投資增加進而可提升勞動生產力，並帶動就業增加；而生產力提升的成果，依勞資雙方協商結果，則分享為工資的增加。工資增加則再進一步促進經濟成長，形成工資與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又工資及就業均增加，亦有助所得分配的改善，進而提高經濟成長。因此，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良性循環的關鍵因素在於工資與勞動生產力同步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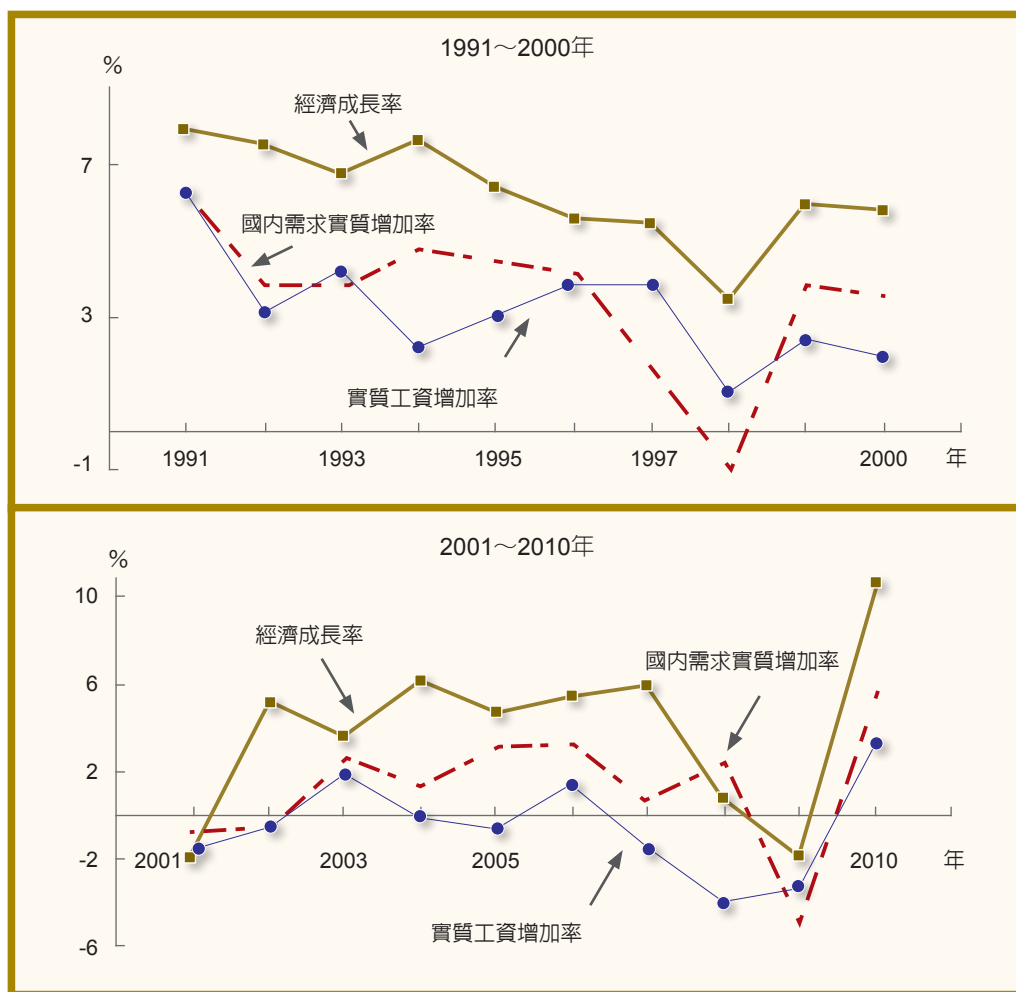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ILO（2011）

圖11 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良性循環的成長模式

¹ 依 Bhaduri & Marglin（1990）定義，一個經濟體的所得分配由工資轉向利潤，即提高利潤份額（profit share）對經濟產生有利的影響，則此經濟體為利潤帶動的經濟體（profit-led regime）；若對經濟體的衝擊是負面的，則此經濟體為工資帶動的經濟體（wage-led regime）。

2. 台灣工資、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的關聯

- (1) 受僱報酬成長停滯且差異擴大為 2000 年後台灣所得分配不均主要來源
 - － 功能性所得分配：2001 至 2010 年受僱報酬（= 工資 × 受僱人數）平均增加率 2.24% 不及名目 GDP 平均增加率 3.01%，致勞動分配率下降 3.68 個百分點，其中受僱人數平均增加率 1.86%，對名目 GDP 的平均彈性 0.62；工資名目增加率平均僅 0.36%，對名目 GDP 的平均彈性 0.12，顯示工資停滯成長為 2000 年後台灣功能性所得分配惡化的主要來源。
 - － 個人或家庭所得分配：動態或靜態分解均顯示，2000 年後台灣所得分配不均有 6 成以上是源自受僱報酬差異擴大。
- (2) 2000 年代台灣工資與經濟成長未形成良性循環
 - － 工資是影響國內需求的主要來源（UNCTAD, 2011），2001 至 2010 年台灣名目工資平均每年僅調漲 0.36%，致消費者購買力不足，實質國內需求每年平均成長 1.46%，僅為 1990 年代的 2 成 2。工資調漲較勞動生產力的提升落後，隱含國內需求的增加不及產出供給的擴增，必須依賴外需來創造經濟成長，輸出為經濟成長的主要來源，對經濟成長的貢獻亦由 1990 年代的平均 63.5%，增至 157.34%，也使得台灣經濟成長深受國際景氣波動影響。
 - － 經濟成長後的果實，為維持出口的國際競爭力，只能壓抑工資成長以降低單位勞動成本，以致勞動生產力的成長遠落於工資的增加，勞動者無法分享生產力提升的成果，故所得分配更加惡化，以致國內需求依舊無法擴增，必須持續依賴出口增長以維持經濟的成長。綜合言之，2000 年代台灣工資與經濟成長未形成良性循環，但此種成長模式是無法永續的。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圖12 台灣經濟成長率、國內需求成長率與工資增加率之變化

(二) 2000 年代台灣工資停滯原因

亞洲開發銀行（ADB）2011 年有關亞洲走向高品質就業的報告指出勞動生產力的提升雖未必可保證工資同比例增加，但最終決定就業品質好壞仍大部分取決於勞動生產力的水準與成長。ILO（2011）亦指出，決定工資水準的重要關鍵因素是勞動生產力。

1. 2000 年代勞動生產力成長減緩，較 1990 年代降低 1.97 個百分點

- 2001 ~ 2010 年台灣勞動生產力平均成長率 2.90%，較 1991 至 2000 年平均成長率 4.87%，大幅減少 1.97 個百分點，因而使實質工資（以 CPI 平減）增加率亦由 1990 年代的 3.23% 轉為負成長 0.57%，而且生產力提升與工資增加間的缺口亦擴大至 2.33 個百分點，較 1990 年的 1.64 個百分點，提高 0.69 個百分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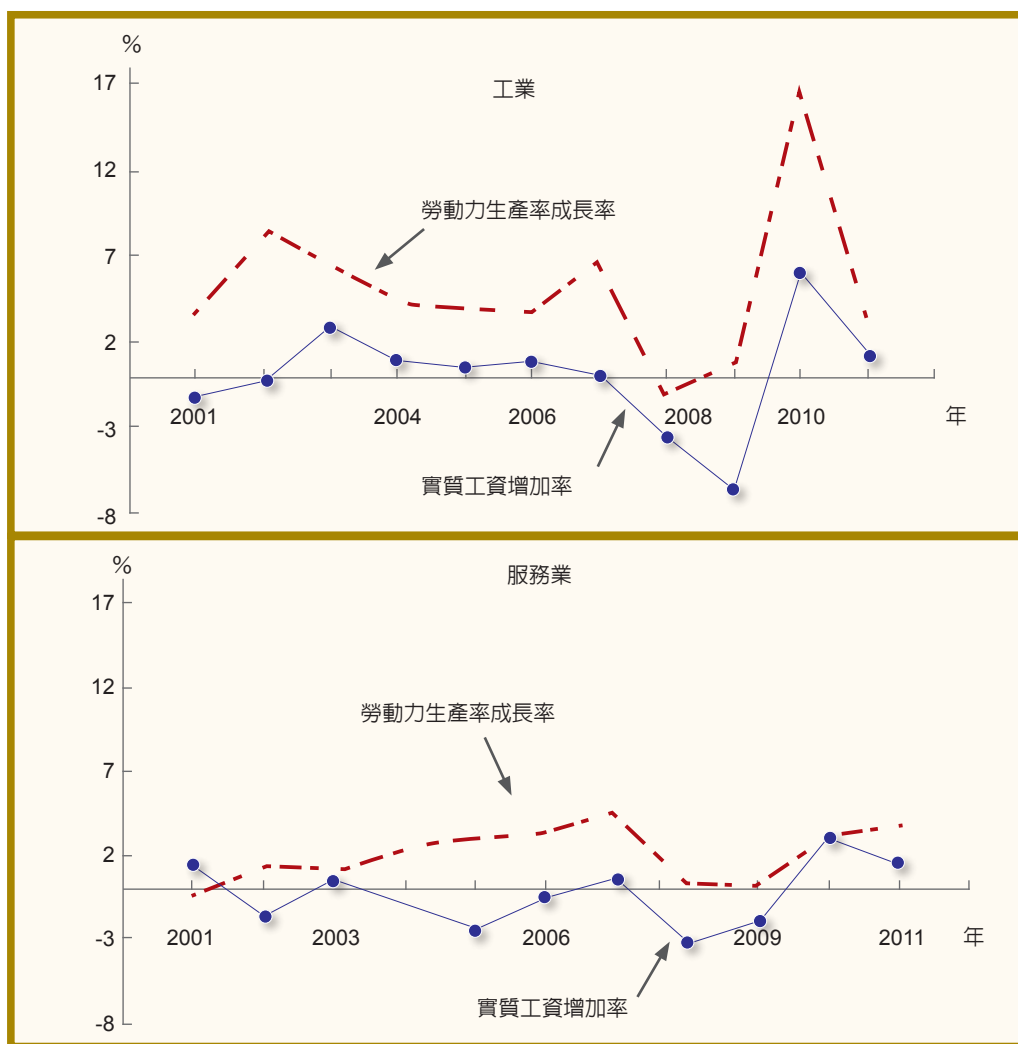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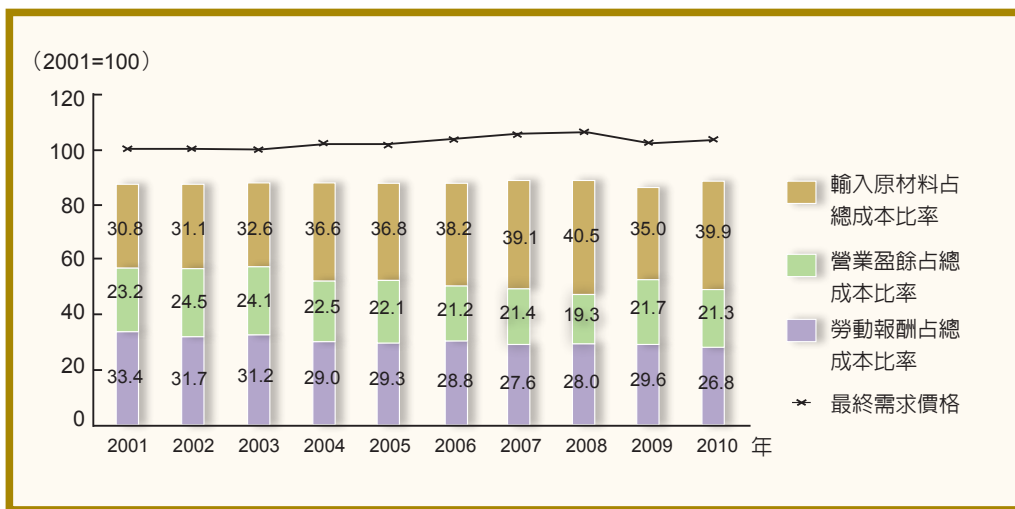


圖13 2001至2011年台灣各業勞動生產力成長率與實質工資增加率變化

- 2000 年代台灣工資平均每年僅增加 0.36%，實質工資更呈現平均每年縮減 0.57%。由產業面分析係導源於占就業比重達 57.74%的服務業，因研發支出偏低及投資不足，勞動生產力成長率僅 2.03%，較前十年大幅降低 2.3 個百分點，因此無法支持工資的成長。由於工資幾近停滯，國內消費動能不足，經濟成長必須依賴出口支應，而出口的製造業產品中又以 ICT 產品為大宗，由於我國 ICT 產品多為代工，為維持產品競爭力，必須降低生產成本，以致勞動生產力的提升亦無法促使工資同步增加。
- 2. 2000 年代實質工資對勞動生產力的彈性由 1990 年代 0.66 轉為 -0.2，顯示勞動生產力與工資的聯繫弱
- 2010 年每單位最終需求產品的價格²較 2001 年上漲 3.47%，其中出口商品價格下跌 4.81%，國內最終需求產品價格上漲 10.89%，低於農工業原料的進口價格上漲率 77.7%，顯示廠商無法將輸入原材料價格上漲所導致的成本增加轉嫁於產品的售價上，必須自行吸收。由成本結構觀察，輸入原材料價格占總成本的比率由 2001 年 30.81%增至 2010 年 39.92%，增加 9.11 個百分點。其中，勞動報酬吸收 6.62 個百分點，其占總成本的比率由 2001 年 33.44%降至 2010 年 26.82%；營業盈餘則分擔 1.94 個百分點，其占總成本的比率由 2001 年 23.22%降至 2010 年 21.28%，另 0.55 個百分點係由折舊等吸收。故輸入原材料價格的上漲約有 7 成是由壓抑勞動報酬的增加所吸收，營業盈餘則吸收 2 成。
- 2000 年後台灣最終需求以出口為主，而我國出口商多為中小企業，且具品牌者少，因此對價格的影響力微小，廠商無法將輸入原材料價格的上漲轉嫁至產品價格，而只好由壓抑勞動報酬來吸收，即使勞動生產力有所提升，亦無法分享成果，故造成工資成長停滯。

² 每單位最終需求產品的價格 = (國內需求 - 輸入) 的名目值 / (國內需求 + 輸入) 的實質值。



資料來源：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資料計算。

圖14 2001～2010年最終需求產品價格變化及其成本結構

(三) 2000 年代台灣工資不均擴大之原因

2000 年代台灣工資不僅成長停滯，分配亦呈現不均擴大的現象。受僱報酬五分配所得差距由 2000 年的 5.68 倍擴大至 2011 年的 7.45 倍高點；100 年 5 月受僱員工中位數薪資 3 萬 2,244 元，低於平均薪資 3 萬 6,815 元，亦較 2005 年 5 月中位數薪資降低 4.4%。

1. OECD 跨國實證

根據 OECD (2011b) 研究，1980 年代至 2000 年代 OECD 國家工資差異每年約擴大 0.014 個百分點，其來源包括：技術進步及政策與制度因素的貢獻平均每年 0.32 個及 0.42 個百分點；工作者教育程度的提高對不均的負貢獻平均每年 0.50 個百分點，約抵消三分之二前兩項不利因素的影響。顯示，教育對降低工資均度是重要的政策工具。此外，貿易及金融自由化則無顯著性影響。

2. 台灣實證

- 根據詹維玲（2011）研究顯示，教育擴張是解釋台灣薪資所得不均最重要的變數。造成家庭薪資所得不均的教育程度變數幾乎都是來自大學（專）教育。
- 根據黃芳玫（2011）的研究，發現人力資本存量之累積對各人口群組薪資成長之影響，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其中，由學校教育所累積的人力資本存量對薪資之成長有顯著的正影響，尤其是對專科以上工作者的薪資成長影響較大。由潛在工作經驗所累積的人力資本存量，對高中職以下的勞動者之實質薪資成長有顯著的影響。而高中職以下勞動者的人力資本存量在1994年之後逐年降低，可能是影響其薪資為負成長的另一重要因素。

參考 OECD（2011b）及黃芳玫（2011）的研究，進行台灣工資五等分位差距倍數迴歸分析顯示，高低所得者教育的差距是影響台灣工資差異擴大的最主要因素（此結果與黃芳玫（2011）與詹維玲（2011）之研究結論相符），其次為技術進步，而貿易自由化則無顯著性影響。

一、台灣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的政策模擬

（一）模型體系

本文探討所得分配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主要著重於所得分配對總合需求各組成份子的影響，其他管道如造成社會不安等所產生的影響則未納入。模型設定主要係參考 OECD 經濟學家 Herve et al.（2010）、日本內閣府（2011）及何金逖（2006）等，模型體系屬凱因斯的理論架構。工資為模型的傳遞管道（圖 15）。

- 模擬結果：經濟成長率 4.18% 較基準方案提高 0.15 個百分點，家庭可支配所得五等分位差距 6.05 倍較基準解降低 0.12 倍，顯示所得重分配以提高勞動分配率，可提高經濟成長，反映台灣屬於工資帶動經濟體。

(2) 模擬二：勞動生產力提升，但工資未完全反應

- 設定條件：假設勞動生產力提升 1%，但工資僅反應 7 成。
- 模擬結果：經濟成長率 4.26% 較基準解增加 0.23 個百分點，亦較模擬一提高 0.08 個百分點；家庭可支配所得五等分位差距 6.12 倍較基準解降低 0.05 倍，但因為提升勞動力的成果仍依原分配方式進行分配，故降低所得分配不均的效果不如模擬一。

(3) 模擬三：勞動生產力提升，工資亦完全反應

- 設定條件：假設勞動生產力提升 1%，工資亦增加 1%，完全反應生產力提升的成果。
- 模擬結果：經濟成長率 4.29% 較模擬二提高 0.03 個百分點，家庭可支配所得五等分位差距 6.09 倍，較模擬二減少 0.03 倍，顯示勞動生產力提升的利益越多反應於工資上，係有益於經濟成長及降低不均。

(4) 模擬四：勞動生產力提升，工資同步反應，並採取租稅政策

- 設定條件：假設勞動生產力提高 1%，工資同步反應亦調漲 1%，並調整租稅結構，降低家庭所得稅中薪資所得者負擔比率 0.5 成。
- 模擬結果：經濟成長率 4.31% 較模擬三提高 0.02 個百分點，家庭可支配所得五等分位差距 5.91 倍，較模擬三減少 0.18 倍，高於 2001 年至今家庭對政府移轉支出對縮小所得差距所產升的效益（0.16 倍），顯示調整租稅結構對國內所得不均的改善具相當效益。

表8 100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及所得分配之情境模擬

	基準方案	模擬方案				
		1. 所得重分配（增加工資1%使薪資所得增加；而非薪資所得降低）	2. 勞動生產力提高1%，工資反應7成	3. 勞動生產力提高1%，工資同步反應	4. （1）勞動生產力提高1%，工資同步反應 （2）降低所得稅中新薪資所得者負擔比率0.5成	5. （1）勞動生產力提高1%，工資同步反應 （2）政府提高社會福利移轉支出100億元，並提高移轉支出中新薪資所得者所分享的比率0.5成
經濟成長率（%）	4.03	4.18	4.26	4.29	4.31	4.32
勞動分配率（%）	45.67	45.95	45.89	45.93	45.95	45.97
家庭可支配所得五等分位差距倍數（倍）	6.17	6.05	6.12	6.09	5.91	5.89

註：勞動分配率＝受僱人員報酬／名目GDP。

（5）模擬五：勞動生產力提升，工資同步反應，並擴增社福移轉支出

- 設定條件：假設勞動生產力提高1%，工資同步反應亦調漲1%，政府並增加社會福利移轉支出100億元，及調整移轉對象，多偏重於薪資較弱勢的族群，使政府對民間移轉支出中新薪資所得者所分享的比率提高0.5成。
- 模擬結果：經濟成長率4.54%較模擬四提高0.01個百分點，家庭可支配所得五等分位差距5.89倍較模擬四降低0.02倍。主要是由於模擬五的移轉支出較高，而模擬四並未減稅僅調整租稅結構，故模擬五對經濟成長的促進作用略高。

四、台灣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良性循環之策略

UNCTAD「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facts and figures (2012)」及「貿易與發展 2012」報告均指出，金融海嘯後已開發國家的復甦脆弱，其根源在於缺乏需求。各國當局在利率水準已降到歷史的低點，且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的貨幣政策在去槓桿化（deleveraging process）的過程中效果亦有限，及過高的公債比使得政府必須緊縮財政支出的情勢下，可用以促進經濟景氣復甦的政策工具已受限。因此，建議採行所得政策，鼓勵工資與勞動生產力同步成長，除可改善收入分配的模式，並可使經濟體創造足夠的國內需求來充分利用現有的生產能量，故在短期即可刺激經濟成長、創造就業，不需以外需來為自己過剩的供給創造需求，形成平衡（balanced）的成長模式。長期而言，尚可進一步鼓勵投資、創新，提升勞動生產力，支撐工資進一步增加，達到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同時提高租稅的累進程度，增加社福移轉支出並強化經濟成長的就業彈性，以實現包容性經濟成長。

由於我國所得分配不均主要來源係工資的停滯成長及差異擴大，故改善的方法首先應促進工資提高，以促使所得的初次分配能更符合其對生產所提供的貢獻；其次，政府可採行租稅及社福移轉支出政策，使所得進行重分配。參考UNCTAD等機構所建議達成國內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良性循環的平衡成長與包容性成長之對策，研提我國達成平衡成長與包容性成長的策略如下：

（一）持續提升勞動生產力，促使工資同步增加

UNCTAD（2011）指出，以勞動生產力為基礎調漲工資，除可達成平衡的經濟成長模式，並可避免工資與價格形成螺旋性的上升，形成通貨膨脹的問題。因此，要使工資不斷增加應持續提升勞動生產力，如此亦可使勞資雙方不是處於競爭的情勢。

(1) 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提高勞動品質

- 亞銀經濟學家 Park (2010) 認為，人力資本對勞動生產力的影響有二：人力資本投資本身即可提升勞動生產力，亦有助於總要素生產力的提升，可再進一步影響勞動生產力。因此，人力資本投資是提升勞動生產力的重要因素，也是使工資增漲的關鍵因素。
- 依黃芳玫 (2011) 研究，人力資本存量的累積對國內各人口群組薪資成長的影響，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其中，學校教育累積的人力資本存量對薪資的成長有顯著正向之影響。另潛在工作經驗對大部分高中職以下的勞動者之實質薪資成長有顯著正向的影響。據此建議應提升學校教育的質與量、加強職業訓練（尤其是非正式部門就業者），以累積人力資本存量。

(2) 激勵投資，深化資本

- ILO (2012) 指出，投資的停滯已對目前已開發國家的就業復甦造成限制，且投資的波動越劇烈，不僅無法激勵新創就業的增加，也限制所創造就業機會的品質如多屬部分工時的工作，壓低薪資的調漲等。而要使廠商進行投資則需提高其對產品需求的預期。
- 近 10 年國內投資擴張減緩每年平均僅增加 0.1%，遠低於前 10 年平均成長率 7.5%，以致勞動生產力平均成長率較前 10 年減少 1.97 個百分點，其中 9 成係源自投資減緩，尤其是服務業投資不足。據此建議改善投資環境，積極吸引外人投資，並加強國內各產業投資。此外，提高知識投資（ICT 投資、教育支出及研發投資），有利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

(3) 鼓勵創新，提高總要素生產力

- 近 10 年來，台灣勞動生產力提升的來源中，總要素生產力的貢獻亦趨重要，由 2001 至 2006 年平均 32.4% 倍增至 2007 至 2011 年平均

62.8%。提高總要素生產力的方法除可經由貿易、外人投資或對外投資等途徑，經由國外技術擴散吸收新的技術。自行投入研發支出進行創新則為另一途徑。自 2000 年以來，國內研發支出平均年增率雖達 7.2%，惟多投入在製造業，投入服務業的投資仍明顯不足，建議應落實《產業創新條例》的執行。

- 世界智財權組織 WIPO（2011）及 OECD（2011a）均指出，非研發型創新對經濟成長的重要性日增，非研發型創新者普遍是服務業、低技術製造業及中小企業。為鼓勵服務業及中小企業創新，建議創新政策應涵括非研發型創新政策包括：透過發明商品化、種子投資（seed investment）或創投資金等計畫協助創新廠商的發展；鼓勵廠商及公共研究機構間的協同合作與技術移轉等。

（二）強化工資與勞動生產力的聯繫，縮小工資與勞動生產力的差距

- 除勞動生產力會影響工資外，制度性因素也會影響工資高低。ILO 建議透過社會對話等集體談判的方式決定工資，認為討價還價和談判是決定工資最有效的方法，因為這樣才能反映工人和雇主雙方的需求和利益。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2012）指出，過去嚴重低估集體談判及最低工資對就業與勞動力市場的其他影響，應關注如何設計該制度，以提高制度的效率。
- 國內 2000 年代工資增加與勞動生產力提升的差距拉大，除反映經濟不平衡成長模式的影響外，集體談判的相關機制不足（包括工會力量的弱化、欠缺有效的社會對話機制等）也是因素之一。因此，建議未來先推動產業別及地方之社會對話，再逐步建構全國性社會對話機制；此外透過《團體協約法》，促使勞資雙方在企業內部建立團體協商管道，以培養勞方工會的對話能力，並持續在各級企業與產業中，推廣並培養工會團體協商之能力與經驗，以強化工會談判的能力。

- UNCTAD（2012a）指出，在集體談判未健全的國家，為快速改善所得分配不均，可以建立最低工資的方式替代。國內雖已有基本工資的設定，但其調漲尚未形成制度。建議建立基本工資調整的合理公式，並予以制度化，以避免每年勞資協議時的爭議，亦能確實照顧基層勞工生活，並激勵廠商技術升級。

（三）降低非正式部門的就業，提高就業所得彈性

- IMF（2012）實證顯示，放寬產品市場的管制及降低非正式部門的就業，可使經濟成長與勞動市場間的關係更密切。
- UNCTAD（2012a）指出，增加就業，以降低失業本身即有助改善所得分配，亦可加強勞方在工資集體協商時的力量。

（四）進行租稅改革，降低薪資所得的租稅負擔，提高租稅的累進程度

- UNCTAD（2012a）指出，加強稅收徵收，提高累進幅度的同時又不削弱經濟成長，是可以辦到的，如對高收入者的金融性資產所獲取的利益課稅等。

（五）強化政府社福移轉支出，完善社會安全網，以改善所得不均並降低預防性儲蓄，促進消費

- ILO（2012b）指出完備的社會福利保障能夠為有效的工資談判及保障勞動者必要的生活基本收入提供有利的制度環境，但不同受益者（勞資雙方）間的社會保障成本與獲益應取得均衡。
- IMF（2011 年 10 月）亞洲區域展望報告，建議亞洲每人所得較高的國家可提高發展失業保險計畫或年金制度等社會安全網，以改善所得不均並降低預防性儲蓄，促進消費。

- 建議強化政府社福移轉支出，擴大照顧弱勢民衆，維護教育機會。另 ADB 指出，各國所需社會保護系統應依國家發展的階段為基礎來建立。目前我國公部門社會安全支出以高齡者（如國民年金、老農津貼、勞退及軍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支出等）及健康（如全民健康保險、公共衛生等）為主，合計約占 8 成。未來在人口老化的趨勢下，對長期照顧及社會保險（如年金）的需求將提高，建議應積極建立長期照顧制度、推動長期照顧保險，並健全我國老年經濟安全保障體系。

伍、結語與建議

一、結語

經濟成長的果實分配給各生產要素，分配的方式將影響所得分配的均等度，反之，所得分配亦會影響經濟成長持續的期間。因此，從長遠的角度而言，縮小所得差距與持續性的經濟成長是同一件事情的兩面（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同等重要。

過去 10 多年，OECD 國家所得不均持續上升有 75% 係來自勞動所得差異擴大，因此多數國際機構提出包容性成長以達到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雙贏的目標。UNCTAD 認為除包容性成長外，採取平衡成長模式，鼓勵工資與勞動生產力同步增加，可使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形成良性循環。因為如此可使經濟體創造足夠的國內需求來充分利用現有的生產能量，在短期即可刺激經濟成長、創造就業，長期尚可進一步鼓勵投資、創新，提升勞動生產力，支撐工資進一步增加，達到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

近 10 年，國內所得分配無論在初次的功能性分配或及分配後的家庭可支配所得分配均呈現不均擴大的現象，已造成國內景氣循環擴張期縮短，降低經濟

成長的永續性。本文就國內所得分配擴大的原因及其如何與經濟成長形成良性循環進行探討，發現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形成良性循環的關鍵在工資與勞動生產力同步成長。另利用總體計量模型進行兼顧國內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的模擬分析，結果顯示，工資與勞動生產力同步增加 1%，經濟成長率較基準解提高 0.26 個百分點；家庭可支配所得五等分位差距倍數降低 0.08 倍。若搭配所得稅中新資所得負擔比重降低 0.5 個百分點，則經濟成長率較基準解提高 0.28 個百分點；家庭可支配所得五等分位差距倍數較基準解降低 0.26 倍。

二、建議

兼顧國內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的方法首先應促進工資提高，以促使所得的初次分配更符合其對生產所提供的貢獻；其次，政府可採行租稅及社福移轉支出政策，使所得進行重分配，亦即實現平衡成長與包容性成長。提出建議如下：

1. 放寬服務業的市場管制，擴大服務業商機，以激勵服務業投資，提高勞動生產力，以利服務業工資的成長。
2. 加強無形資產投資，製造業著重在品牌的經營，服務業則著重在非研發型創新，以提升產業的勞動生產力。
3. 建立勞資政三方社會對話機制，進行集體協商以強化工資與勞動生產力的聯繫。
4. 提高人力資本投資，尤其是非正式部門就業者及低所得者，以提升勞動品質，有助縮小工資差距，改善國內所得分配。
5. 推動租稅改革，課徵資本利得稅，提高賦稅的累進度，強化租稅對所得重分配的功能。🏠

一、中文部分

1. 黃芳玫（2011），「台灣人力資本與薪資不均之研究」，《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2. 陳建良（2011），「台灣所得分配變化趨勢之分解」。
3. 何金巡、周麗芳、林建甫、許振明（2006），「台灣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的總體經濟計量分析」，台灣經濟學會與北美華人經濟學會 2006 年聯合年會，12 月 17 日。
4. 詹維玲（2011），「Wage Inequality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aiwan（簡報）」。
5. 饒志堅、蔡鈺泰、連子惠、莊文寬、葉芳珠、黃麗妃（2008），「全球化對所得分配影響之研究」。

二、英、日文部分

1. ADB (2012),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2 – Confronting Rising Inequality in Asia", April 2012.
2. ADB (2011), "Toward Higher Quality Employment in Asia", 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11.

3. Berg, A. and J. D. Ostry. (2011a),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Is there a Tradeoff between the Two or Do the Two Go Hand in Hand?",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48(3). pp.12~15.
4. _____.(2011b), "Inequality and Unsustainable Growth: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SDN 11/08.
5. Berg, A., Ostry, J. D., and J. Zettelmeyer (2012), "What Makes Growth Sustaine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 Bhaduri, A. and Marglin, S. (1990), "Unemployment and the real wage: the economic basis for contesting political ideologi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4 (4): 375-93.
7. Herve, K. et al. (2010), "The OECD's New Global Model", OECD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s, No.768
8. Hoeller, P. et al. (2012), "Less Income Inequality and More Growth – Are They Compatible? Part 1, Mapping Income Inequality Across the OECD",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 924, OECD Publishing.
9. ILO (2011), "World of Work Report 2011, Making Markets Work for Jobs".
10. ILO (2012), "World of Work Report: Better jobs for a better economy".
11. ILO (2010), "Global Wage Report 2012/13: Wages and Equitable Growth".
12. IMF (2011),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 Asia and Pacific : Navigating an Uncertain Global Environment While Building Inclusive Growth", Oct. 2011.

13. IMF (2012),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 2012.
14. Joumard, I., M. Pisu and D. Bloch (2012), "Less Income Inequality and More Growth – Are They Compatible? Part 3. Income Redistribution via Taxes and Transfers across OECD Countries",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 926, OECD Publishing.
15. Koske, I., Fournier, J.-M. and Wanner, I. (2012), "Less Income Inequality and More Growth – Are They Compatible? Part 2. The Distribution of Labour Income",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16. OECD (2011a),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Scoreboard 2011", Sept. 2011.
17. OECD (2011b), "Divided We Stand: Why Inequality Keeps Rising", Dec. 2011.
18. OECD (2012), "Economic Policy Reforms 2012 : Going for Growth", Feb. 2012.
19. Park, J. (2010), "Projection of Long-Term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for 12 Asian Economies,"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27.
20. Stockhammer, E., Onaran, Ö. and Ederer, S. (2009), "Func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aggregate demand in the Euro are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3 (1): 139-159.

21. UNCTAD (2010),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UNCTAD: Geneva.
22. UNCTAD (2011),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UNCTAD: Geneva.
23. UNCTAD (2012a),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UNCTAD: Geneva.
24. UNCTAD (2012b),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facts and figures".
25. WIPO (2011),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port 2011 – The Changing Face of Innovation".
26. 佐久間隆、増島稔、前田佐恵子、符川公平、岩本光一郎 (2011), 「短期日本経済マクロ計量モデル (2011 年版) の構造と乗数分析」, 日本内閣府経済社会総合研究所 ESR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259。